

詩壇正來在一個「引爆點」上

◎ 藍棣之

Tipping point, 「引爆點」。這個術語源自流行病學,指某種傳染病達到超出任何能控制它進一步傳播的能力的「點」,又譯「拐彎點」、「翻轉點」、「踢爆點」等。格拉德威爾在他所撰的暢銷書《引爆流行》(*The Tipping Point*)中給出的定義是:「質變來臨前的關鍵一點,就像沸點和臨界點」。我在此文中使用此術語的意思是,「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的高調出場,使詩壇來到一個重要的「引爆點」上。自1990年以來一直在不斷被邊緣化的詩壇,很快就會來一個「大轉變」。

兩年前(2006)的秋天,在北京大學和首都師大聯合舉辦的一次「國際詩歌研討會」上,我曾經呼籲在對待意識形態問題上來一些變化,以改變詩壇長期被自己心甘情願地封鎖在邊緣地帶的困局。我帶去的論文題目為《從歐陽江河的那篇長文談起》,我所談的歐陽江河那篇長文的題目為《1989年後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徵與知識份子身份》,發表於1993年2月。論文的作者歐陽江河平日喜歡涉獵新的理論,求新求異求深,我感覺他是當下詩壇理論方面的話題人物。他這篇著名論文(在他的詩文集《站在虛構一邊》[2001年三聯版]裏佔了45頁)實質上是「知識份子立場寫作」的「話題」淵源。但我並不打算在這裏分析他關於「知識份子立場寫作」可能性的論述,而是要分析他關於意識形態對於新詩的影響的相關論述。

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青年詩人,歐陽令人印象深刻地描述了意識形態對於新詩創作的深刻影響。他說:1989是個非常特殊的年代,屬於那種加了著重號的、可以從事實和時間中脫離出來單獨存在的象徵性時間。他說對一代詩人的寫作來說,1989年並非從頭開始,但似乎比從頭開始還要困難。已經產生了一種深刻的中斷,詩歌寫作的某個階段已經結束,許多作品都失效了,以往的寫作成為隔世之作。在這種情況下,有沒有一種新的寫作可能性呢?歐陽論述說:對抗主題的寫作顯得無足輕重,難以構成真正的對抗,抗議作為一個詩歌主題,其可能性已經被耗盡了。

他一方面排除為群眾運動寫作和為政治事件寫作,另一方面他又注意到政治並非處於生活和寫作之外,也非缺席於生活和寫作之中。他失望地問:「那個叫做權力、制度、時代和群眾的龐然大物會讀我們的詩歌嗎?」歐陽從1989-1993這個「轉型期」創作裏總結出的詩歌寫作可能性的主要趨向就是知識份子立場寫作,以及這種寫作的三個要點:本土氣質、中年特徵和知識份子身份。我在《論當前詩歌寫作的幾種可能性》(《文學評論》2000年第5期)一文裏給他的立論做了一個概括,給予充分肯定,但認為他只談知識份子的晦澀寫作這種可能性,未免把路想像得太窄了,態度也相當悲觀。儘管如此,這篇論文仍然是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一個重要的出發點,是一篇重要文獻。

我認為歐陽江河在這篇論文裏所表述的關於詩歌寫作與意識形態關係的觀念,對於後來的

「知識份子立場寫作」，甚至對於1997民間立場與知識份子立場的論戰，都有深刻影響。我認為也就是從這篇論文開始，詩歌創作開始始料所未及地走向邊緣化，詩壇不僅以處在邊緣地位自傲，也以此悲壯地故步自封。

我自己身處其中，可是我的心情異常複雜。我總覺得非常可惜。我總認為被歐陽江河叫做「龐然大物」的東西，是會起變化的，而且隨時都在變化之中。同時，對「龐然大物」的看法，也會變化，甚或變化早已開始。我總是在尋找變化的蛛絲馬跡和變化的可能性，希望有所發現。果不其然，在2005年夏天，即歐陽文章之後的十二個年頭，我讀到美國學者湯普森的專著《意識形態與現代文化》。通過這本綜述性的厚部頭著作，我瞭解到在西方理論界，有一批很有影響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一直都在談論「意識形態的終結」這個話題。他們論證說「意識形態時代」即將告終，舊的「意識形態政治」、「意識形態時代」已經完結，政治進程可以越來越在一個多元化的架構內形成體制化。同時，他們對於法蘭克福學派批評理論的社會觀和政治觀進行質疑，認為激勵早期批評理論家著作的一些理論和抱負，已經被20世紀後期的歷史現實弄得黯然失色。

根據這些論述，我感覺到，中國詩壇關於民間與官方的二元對立過於簡單了，應當讓位於多元化的框架；文學、詩歌與意識形態的簡單對抗，所謂「文學的任務就是對抗意識形態」等法蘭克福格言，已經因歷史現實的巨大變化而顯得不合時宜。詩壇在這方面，顯然已經落後於時代，落在潮流之後，就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那樣，還在那裏堅持著什麼，真夠讓人傷感的。所以我借回歐陽江河的論文，呼籲詩壇擺脫落後的思維狀態，走出邊緣化處境，儘快及時趕上時代。

如今（2008）時光又過去了兩年。這兩年裏，全球化進一步發展，世界變化更大，中國的崛起和變化，有目共睹。在為制定一些重要法規（例如《物權法》）而出現爭議時，中央政府設法避開關於意識形態的討論。國家的政策決定同意識形態越來越不相關。外國觀察家認為中國政府是一個基本上成功地排斥了意識形態的政府（Leslie Hook, "The Rise of China's New Lef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007）。我懷著更多的自信，繼續尋找著詩壇走出邊緣的轉機。今年（2008）4月，青年學者楊四平約我去安徽蕪湖出席有關白鴉的詩歌活動，在與白鴉、北魏、楊四平等詩界青年朋友的交往與交談中，我忽然覺得我看見了希望，看見了詩壇擺脫過時觀念的契機，看見了詩壇正來到一個重要的「引爆點」上。

長話可以短說，最主要的是我看到白鴉、北魏和楊四平等幾位朋友在詩論和詩創作上的成就，我覺得正是我要尋找的，正是我要發現的。我在白鴉的詩論裏看到「反對盲目對抗意識形態」、「反對盲目解構」和「民間與知識份子的對立已經沒有意義」，我吃了一驚，然後我認定，這是一種新的聲音！然後北魏的詩讓我振奮，北魏所敘述的他進入「民間資本」的敘述，其間的恥辱與尊嚴，讓我瞭解事態的深度，他關於關注周邊現實的理念，我認定這是一種新的詩歌！在興奮之中，最終我認為用「中產階級立場寫作」來形容我內心的湧動，來定形我長期以來的尋找為好。楊四平敏銳地抓住這個話題，他提出立即編輯出版一部相關詩集，並撰寫重頭前言。我贊成並欣賞四平的安排，我認為在把「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當成詩歌流派和文藝思潮甚至文學運動推出之前，先行出版一本相關詩選是很有必要的。

關於楊四平所主編的這本詩選，在這裏，我只想說，它正吻合了我心中關於「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的最重要、最核心的想法，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為這樣幾句話：它以中產階級的身份或立場，表達中產階級在當下的體驗和理想。在處理素材時，它有中產階級的眼光。它敘述中

國中產階級獨特的故事，敘述中國創業者成長中的自敘傳、血淚書和懺悔錄，還有北魏所說「敘述他們內心的戲劇性衝突和批判精神。」當我想到十年之內中國將有成千上萬的民營企業家、商家、知識份子和千萬農民進入城鎮成為中產階級，我就認為詩壇走出邊緣愈早愈好。一旦走出，就可以大有作為。正是因為這個，我希望四平所主編的這本詩選成為「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的一個標格，而白鴉、北魏則是這種寫作的得風氣之先者。

文章寫到這裏，我忽然想到一個美國朋友今天剛發來的一個電子郵件。它的內容與我的文章主題正好有些關係。這位朋友大名Charles，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耶魯大學教授，IUP中文專案主任，被推選為本屆（海外）中國文學與比較文學協會ACCL主席。他正在安排2009年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主題初步定為「作家，評論家和學者：中國文學與公眾知識份子」，目前他正在撰寫「徵稿啟事」，但還沒有寫好。他說如果我不太忙的話，他想在日內請我喝茶，一起看看「徵稿啟事」，提提意見。我於是想，還是「旁觀者清」呵，Charles博士在此時提出中國作家與公眾知識份子的關係問題，真是太及時了。

我又記起歐陽江河在上文所述文章裏的論點，他說詩人既不是專業知識分子，也不是普遍意義上所謂知識份子，甚至也不是體制內知識份子，真是再邊緣不過了，或可謂是邊緣的邊緣。我覺得問題可能就正在這裏。正好相反，作家和詩人，在我們目前所處の後現代社會或消費社會裏，在文化、文學已經成為產業或消費品的時代，如果不想隨波逐流和被無限地邊緣化，他就應該成為所謂普遍性知識份子或公眾知識份子。90年代以來所謂「個人化寫作」，以及知識份子或民間立場寫作，甚至第三條道路寫作或中間代，下半身，所有這些寫作立場，都應該適當調整自己的身份認同。如果有誰期望公眾喜愛他的文學、詩歌創作，他就應該瞭解公眾的利益與願望，並且感同身受。

我記起美國現代社會學奠基人，《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的作者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像力》一書中曾經諄諄希望，他說現代作家應該多瞭解一些社會學裏的問題，因為傳統的作家在作品裏提出了好些社會問題，所以他的作品為大眾所關注，而今這類問題都進入了社會學，已經不在文學作品裏。傳統作品提出社會問題的功能，已經讓位於現代主義作品的純粹審美功能或藝術形式語言的實驗。所有這些價值，在目前的後現代社會裏被消解，這的確讓人很傷心，不過，如果作家或詩人若能刻苦學習和投身社會實踐，並把自己培養成合格的公眾知識份子，他就算是得到了補償。而我們的中產階級立場寫作的宣導者或堅守者，若能兼有公眾知識份子的品格，那一定是中國的大幸。我認為，事實正是如此，或者說事情正在往這個方向發展。這也是我讀了四平所主編的這本詩選以及它的理論性很強的「前言」後最受鼓舞的一點。

藍棣之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九期 2008年10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七十九期（2008年10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